

对“略談人民公社圖書館”一文的意見

柏 森

黃宗忠同志的“略談人民公社圖書館”一文，已分別在“新文化報”（1月10日）、“圖書館學通訊”（59年第1期）和“圖書館工作”（59年第2期）上全文或摘要發表了。這篇文章引起了圖書館界的廣泛注意。

這篇文章比較全面地系統地論述了目前人民公社圖書館的產生、建立，人民公社圖書館的性質、方針、任務……“業務輔導和干部培養”等一系列的重要問題。我們讀了之後，得到了不少啟發。

不過，人民公社圖書館對我們來說，畢竟是個新的問題，所以，大家都還或多或少地缺乏經驗與認識。因而，“略談人民公社圖書館”一文中的某些論點或提法，是否完全妥當無誤，我們覺得還需要大家來共同討論和研究。在這裡，我們提出一些認識與体会，用以和“略談‘人民公社圖書館’”的作者商榷，並就正於圖書館界的同志們和廣大讀者。

（一）

文章談到：“人民公社圖書館的性質：……是在黨領導下由社自辦的群眾性的文化組織”，這一點是對的。但是，不能“因它又是公社舉辦的”，而強調“一切資金的來源，干部的調配，設備等都由公社自己解決”。因為這不符合“開門辦館，勤儉辦館”的精神；同時，目前人民公社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辦到。

我們認為，既然“公社圖書館是公社全體社員所有的文化組織”，那麼，必然地只有依靠社員群眾的集體力量，才能將它办好。至於公社的公益金部分，那是應該“完全合理地用之於擴大工農業生產，基本建設，交通運輸及目前必需的文教衛生的建設上面”去的。圖書館的經費，在這裡只占到文教衛生費中的一個極有限的數字。因此，我們不能大手大腳地去要求，說是：“圖書經費的來源，主要是從公社公益金撥出”（文中著重點為筆者所加）。作者還舉了這樣的實例：“湖北浠水縣十月

公社圖書館計劃1959年撥出公社圖書采購費一萬元”。但這是整社以前的事情。經過整社，連公社圖書館館長都精簡了，而由文化館長兼任；當然這一萬元巨款，公社黨委是更不會批准了。其實，這個例子並沒有普遍意義，而且還很不妥當。我們絕不能因為要辦圖書館，而任意加重公社的經濟負擔。要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們認為，大躍進中各地群眾大辦圖書館的經驗就是方向，應該繼續堅持下去。

同時，在去年大躍進的基礎上，我國工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全面的發展，相對地便感到勞動力的不敷應用。而作者不顧實際情況，要求公社調配幹部來辦圖書館（當然應該辦），這是將圖書館工作強調到不適當的位置了。事實上，假如按照“公社圖書館一人，大隊圖書館半脫產一人”去配備工作人員，那麼，全國將花去數以萬計的勞動力來專門搞圖書館工作（這並不意味著圖書館工作不重要）。而且，這些幹部，一般都要求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（思想進步那是不待言的），這就勢必是抽調一批生產上的骨幹力量。這樣焉能不影響生產！因此，我們應該以提倡公社各圖書館盡量利用群眾餘力來辦，較為適當。這是一個方法問題，也是個方向問題。

在談到“開門辦館，勤儉辦館”時，文章只著眼於“公社圖書館必須向全體社員開門，為全體社員服務，並想盡各種辦法滿足社員對圖書的需求”這一方面，而嚴重地忽略了“開門辦館”、走群眾路線的更重要的一方面。固然，“門要大開，要千方百計吸引讀者，為讀者服務”，但是，我們的体会是：所謂“開門辦館”，就是把圖書館交給群眾自己來辦。即大膽放手，在群眾的參與下積極地開展圖書館工作。因為群眾辦文化事業（其實，別的事業也如此），有很大的優越性；它既能符合群眾的習慣要求，還能辦得又多、又快、又好、又省。而且，群眾對自己亲手營造的事業，格外地愛護和關心。

如果不着边际地仅仅講些“必須是勤俭办館，节约資金，不浪费一文錢，認真貫彻多快好省的原則”，而不主动依靠群众，那是沒有任何基础的。因为“开门办館”正是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的群众路綫的具体化。

(二)

作者在論及人民公社圖書館的性質時，还提出：“公社圖書館是党在农村对广大社員……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基地”。这种提法是不完善的。因为“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、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，而在这整个过程中，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”，尽管“从现有的經驗看來，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，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时间可能早一些，但是也不会很早。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，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、电气化，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、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尽管我們前进的速度較快，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；全部完成这个过程，从現在起，将需要经历十五年、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”（中共中央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”）。无疑地，我們在现阶段的任务，是积极努力地建設社会主义，根据总路綫的精神办事。作为群众思想工作之一的圖書館工作，自然更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现实。所以，将“……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基地”一語改为“……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基地之一”，較为恰当。这样，也就可以避免某些人在思想上产生誤解。虽然，我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：“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”，然而，現在仍是过渡时期，所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，是十分必要的，一点也不應該放松。

由于人民公社目前是属于集体所有制經濟，因而它与全民所有制仍需有所区别。作者将目前的县联社圖書館（县館）和人民公社圖書館相提并論，并将它们列為一个完整的組織系統，这是欠妥当的。同时，作者認為“公社圖書館是我国现阶段公共圖書館系統的基层組織”，这同样是值得研究的。

虽然，“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，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組織的基层单位”，但是，我們認為在目前來講，县联社圖書館（县館）仍为国家所办（全民所有制的），人民公社圖書館則为公社集体所办（集

体所有制的），两者是有些不同的，不能併为一个系統。因此，被列为公共圖書館系統的基层組織的，仍應該是县联社（县）圖書館，而不是人民公社圖書館。实际上，人民公社圖書館是公社各圖書館（室）的通称；它們在性質上与公共圖書館尚存在着一定的差異。

至于“人民公社圖書館的組織系統，一般應該是和人民公社的行政組織相适应”的說法，我們大致上同意。因为人民公社圖書館为了更好地、更有效地配合政治中心工作，服务于生产，在其組織形式上也能作到与生产組織完全一致，当然是有它更利于开展工作的地方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非如此不可。而應該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，还要视条件的可能与否；如果要求得过高过急，甚至盲目追求“正規化”，等等，那对工作就没有什么补益了。況且，就目前情况而論，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工作发展是很不平衡的，不可能要求各处都一样。而且文化革命进行的程度也不尽相同。因此，提出人民公社圖書館的建立也應該与人民公社的組織系統相适应，“即联社圖書館（即县館）——公社圖書館——大队分館——中心圖書站——圖書閱覽站（即现在的食堂閱覽站、田間閱覽站、农忙閱覽亭）”，实际上是有相当困难的。

从我們在湖北浠水县的一些工作情況看來，各公社誠然都建立了圖書館，可是，它們并不是全按上述系統組織起来的，而只形成了圖書館网的縱的关系。甚至有的公社圖書館还很不成系統。如有的大队根本沒有設立分館，只是在生产队下面建立了許多圖書閱覽站（亭）；其中最起作用的，又当首推食堂閱覽站（閱覽、外借）。可見，成系統与否，只是个組織形式上的問題。我們的社員，一般也都不“求大求全”。沒有系統，但只要圖書館工作能够紧密地結合中心，促进生产发展，也就行了。

說实在的，大队分館所起的作用較小，中队圖書室的作用，也不怎么显著。因为在它們下面所建立的圖書閱覽站，到处都是，圖書活动也較頻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向大队分館或中队圖書室借閱圖書的人次，就相对地減少了。所以，这两級可以併为一級，設中心圖書室；或者干脆取銷，而代之以若干圖書閱覽站，这也是可以的。

从这个現實意义出发，我們認為把公社圖書館的組織系統硬性地規定为四級，是过于絕對化了

些，不妨予以灵活运用，掌握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的原则。比如：最近湖南省广大农村正在大办食堂阅览站，却并不先按什么系统去建立，这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又如在广东等居民较集中的农村里，办图书馆（室）又得以这一特点为依据，针对社员群众的需要来建立了。

所以，我們提出：公社設图书馆，生产管理区（大队）或生产队可設若干个图书室（实际上，现在很多生产队图书室，就是一个較大的食堂閱覽站），在食堂或居民点和其他社員經常集中的场所，分設图书閱覽站（亭）或图书流动站（台）。不过，在生产管理区（大队）或生产队所属的若干图书室中，要择定一个中心图书室，以便领导；也担负上下联系的责任，成为沟通公社图书馆与各閱覽站在业务上发生更多关系的桥樑。这样，仍然是个完整的組織系統，也同样地普及了图书馆网。但这較之四級的組織系統，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实际意义；也由于它們更接近了基层生产单位，因此，工作起来就更加方便了。在生产上，也将起到更广泛的推动作用。

必須指出，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本身也是在发展着的，它将日益臻于完善；随着共产主义新村的不断涌现，居民将更加集中起来……因而，人民公社图书馆的組織系統与形式，也将随之而发生变化。这是又当別論了。

（三）

在关于“普及与提高”問題的論述中，作者这样写道：“目前，我国农村情况是許多地区已扫除文盲，有的還沒有。因此当前應該以普及为主，但同时也應該考慮到今后的发展，因此大队以下的图书馆應該以普及为主，公社图书馆是普及与提高并重，联社图书馆可适当地以提高为主”（着重点为笔者所加），显然，这是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作了机械的理解。

文章認為“普及与提高”可以“并重”，或“相兼顾”，好像这是放在一块的混合物，只要用物理的方法，就可以毫不費劲地使它們分开来似的。似乎哪里需要“普及”，就拿“普及”去对付；哪里需要“提高”，就把“提高”拿到哪里去就是了，可以随心所欲。将二者目为互不联系的对立体，因而，便得出“應該有所分工，有所区别”的錯誤結論来了。

基于这种片面的認識，作者便将县联社（县）图书馆和人民公社各图书馆（室）作了主观臆想的分工，所謂“大队以下的图书馆應該以普及为主……”云云。然而，我們感到有些奇怪：难道“因为农民刚扫盲，巩固扫盲成果是主要的”，普及工作就應該全由“大队以下图书馆”来做嗎？做得了吗？难道說“全联社的提高任务”就只能交给“联社图书馆担任”嗎？担任得了嗎？認為流通薄本的、通俗的書刊（亦即作者所謂“普及的图书”）是普及，流通“深一点的書”是提高；或者說，为刚扫盲的广大社員服务是普及工作，为“学校、公社干部、工厂等”服务，就是提高工作。与其說这是認識片面，倒不如說是思想方法不对头，也許更确切些。

当然，公社各图书馆（室）为刚扫盲过的社員們服务是普及工作，但这何尝不是提高工作呢？因为社員們有很多是由不識字到識字，由識字少到識字多，而至于能閱讀图书……这恰恰是提高的过程。我們图书馆（室）根据社員群众的实际需要，提供一些适合他們閱讀水平与能力的图书，怎能說这不是又普及又提高呢？这正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！如果說，少数人（如农民中的專家、作家、詩人等）需要深一点的書，公社各图书馆无法供应，那是可以通过互借的办法，向联社（县）图书馆要来，以滿足这少数讀者的要求（讀深一点的書）；县城里集中了部分知識分子，誠然需要以适合他們水平的图书去滿足其要求，但这也可通过互借，向省（市）图书馆求得解决。这些，都是具体工作的作法問題，并不因此而非使“普及与提高”“應該有所分工，有所区别”不可。

我們必須明确，当普及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，社員們在新形势下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来，需要公社各图书馆尽量給以滿足，因此，我們在普及的同时，也要抓提高工作，否則，工作一定脱离群众。关于这一点，毛主席早有指示：“人民要求普及，跟着也就要求提高，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。在这里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，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。而这种提高，不是从空中提高，不是关門提高，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。这种提高，为普及所决定，同时又給普及以指导”（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”）。因此，这二者既不能等量齐观，更不能有所偏废。

普及与提高是对立物的統一，它們的关系是辯

証的。如果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（如扫盲），那就應該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地提高（巩固扫盲成果或讀“深一点的書”），以求达到在提高指导下的更大的普及。于是，普及，提高；再普及，再提高，……如此往复循环下去，以至无穷，而它們也就一級高似一級，一层好似一层，每循环一次就将普及与提高深化了一次。这个过程，也就是不断革命的过程。

去年，在全国文化局(厅)长會議上，中共中央宣传部周揚副部长也作了指示：“要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，必須坚决走群众路線，貫彻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的方針。”他說：“当前文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普及，普及是主流，是根本，是基础，同时普及必須和提高相結合，普及是群众性的普及，提高也是群众性的提高”。这就更加清楚了，普及与提高是一个問題的两方面，是缺一不可的。我們必須一手抓普及，一手抓提高。不管是哪一級圖書館，都同时担负着普及和提高的任务，都要很好地貫彻普及与提高相結合的方針。

（四）

應該着重指出，“略談人民公社圖書館”一文，基本上是从湖北浠水县的情况出发的。

浠水县，也是全国頗有名声的文化县。它的文化工作一向搞得不錯，原来的基础也較好，所以，在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，文化革命就已有了苗头；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群众的詩歌創作运动上。一年来，浠水的劳动人民，创作了詩歌多达550万篇。这个群众性的創作运动，还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文化工作。現在，全县8个公社共建立了文化館8个，大队文化館62个，中队文化宮602个，食堂建立俱乐部2,098个，圖書館、博物館各41个，文艺大学8所，大队文艺学校62所，有整套的县级文化組織……普及了小学教育，增办了中学和一所綜合性大学，群众中的文盲已基本扫除……总之，浠水不仅在生产上丰收了，而且在文化工作上也搞出一定成績。

这里的圖書館也都粗具規模，一般地都在开展工作，当然，工作中难免不产生些問題。很多困难也需要不断地去克服，但总的說来，条件还好。在武大圖書館学系97个师生下放浠水以后，通过两个半月的劳动、工作、学习（科研）……輔导了3个

公社圖書館，9个大队分館，39个生产队圖書室，68个食堂閱覽站，还协助县圖書館举办了干部訓練班大小計25期，訓練了干部226人，从縱的方面布起了圖書館网。……經過这許多实际工作的鍛炼，各种活动的展开，……我們共写出了論文230多篇，印出了十个論文集子，编写了一套“人民公社圖書館丛书”，……成績是不小的。同时也使这里的圖書館工作出現了新的面貌。这是党的教育方針的胜利。

黃宗忠同志的这篇文章，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。我們对于它的精神与出发点，是沒有異議的；同时，它也总结了群众的工作經驗，加以系統的整理，使之条理化；对人民公社圖書館的全部工作与活动，作了較恰当的估計和肯定。文章有鮮明的立場，倾向性也很強。除了在上文中我們已提出了一些不一定正确的意見和看法之外，其它論述，我們大体上都同意的。这篇文章的成就，恐怕誰也不能一笔抹煞。

但是，我們总觉得有个問題值得提出来，那就是：作者似乎沒有更多地去考虑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。因此，浠水的特点在文中較为突出，那里的工作經驗也在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但是简要的反映，……这是好的一面，然而，就目前全国的一般情况来看，文章又有它不够的一面，即在論述范围上受到了一定的局限。一方面，浠水人民文化較普及，活动开展得好，等等，恐不能与他县一概而論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九十多个学过或正在学圖書館专业的人，都集中力量在那里搞圖書館（室）工作（这只是我們的任务之一），不管怎样，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。通过我們与群众的劳动創造，浠水县人民公社圖書館工作的質量是提高了不少。但根据目前全国一般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，则論文在某些方面的要求是过高了些。

比如：“公社圖書館應有統一的分类法，編目要简单明了，……采用活頁式目录或書本式目录”，“联社圖書館的書要流通到社級的圖書館”，“上一級圖書館應該主動地在业务上輔導下一級”；特別是关于“指導讀者閱讀”、“业务輔導和干部培养”問題，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实际，有的在目前提出来，是不太现实的。事实上，目前人民公社圖書館一般地都沒有設專职干部，仅有的业余管理員，誰也沒有学习过多少业务知識，工作时间也較短暫。而且都不是像浠水县某些公社圖書管理員一样，跟

着学过专业的（或正在学专业的）人一道，按正规办法来开展工作，因此，他们在业务上还是十分生疏的。如果过早地以上述要求来一律要求他们，显然是难以办到的。所以像作者这样，从浠水县的现有水平出发，来要求全国所有的人民公社图书馆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值得认真研究的。因而对解决当前人民公社图书馆建设的实际问题来说，这篇论文的指导意义也是不够的。

（五）

最后，我们另外提出一些关于人民公社图书馆的意见，供大家参考。

我们认为，人民公社各图书馆（室）都可以有购书权，因为它们的经费来源，目前主要是“从公社公益金拨出”，而是依靠党团组织去发动群众献书、存书、捐钱等（但不是说这是长久之计）。所以，公社图书馆（室）可根据当前政治中心、生产任务、社员群众的正常需要，以及地区特点、民族特点等，利用群众的捐款，派人去附近（或城镇）新华书店选购各种图书。至于使用推荐目录，或订购单等办法购书——这种坐在下面等书上门的办法——对公社各图书馆来说，往往会遇到很多疑难的。在采购原则，目前也大可不必搬用大型馆的条文，如“适当地照顾图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”等。而应特别注意“少花钱，买好书”，“少吃多餐”，“勤买少买”。这也是很值得提倡的一条。

在图书的管理方面，我们完全同意“……简单便利，既能解决当前问题，又能适应今后的发展”的总原则。但当作者在叙述一些管理方法时，却又离开了这一原则，不切实际了。我们的初步意见是：公社图书馆（室）暂不要求有“统一的分类法”，只采用“统一书号”来分类图书就够了。有些图书管理员反映：“这办法（指按“统一书号”分类图书）好；十七大类容易学会”。如果有些公社馆有条件，那也是可以使用“统一的分类法”的。

作为公共图书馆基层组织的联社图书馆，可以进行分类、编目等等技术加工，采用卡片式目录也好，活页式目录或书本式目录也好，都可以。至于公社各图书馆（室），我们的看法是不必怎么去苛求它，而提倡将图书登记、分类、编目三者合而为

一（现在一般都未编目，所以，只是登记、分类二者合一）。图书一律实行开架阅览，方便群众；在一些图书馆（站），还可以逐步推行无人管理的办法。同时，更要充分发挥图书袋和百宝箱的作用，广泛地宣传和流通图书；尤其是图书袋，还有着推荐图书的意义，袋上所开列的书名等项，实际上代替了明见式目录。我们相信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群众性读书运动中，这些灵活、便利且具有战斗力的图书袋等图书活动方式，将会进一步地显示出自己的积极作用来。

说到“指导读者阅读”问题，我们觉得“进行读者辅导首先要了解读者的思想情况、文化程度、工作情况等，了解的方法……”这段话，对公社各图书馆的管理员来说，是没有意义的空谈，因为这些管理员也就是社员，他们在目前一般都不脱产，所以，与社员群众联系很紧密。也熟知每一个社员的情况，用不着多说。不过，这段话对我们下放的同志来说，还是有用的。我们觉得，就目前情况看来，公社各图书馆一般还无力进行如此正规的读者辅导工作，而应该将图书的宣传、流通和可能进行的一些读者辅导工作结合起来。

关于“业务辅导和干部培养”，我们认为也一样地不能迷信、保守，但也不应讲得太远。目前，这些工作主要应由县联社图书馆来担任。因在人力、物力等方面，它都是较公社图书馆有条件多了，而且今后仍要担负起这项任务（那时，公社、大队图书馆（室）可能也做一部分）。现在要求“上一级图书馆应该主动地在业务上辅导下一级，……”，进行层层辅导，这是做不好的。“公社、大队所办的工厂、企业、学校、机关图书馆，在业务上受同级图书馆辅导”，也说得过早。一方面，存在着客观上的困难；一方面，也受图书管理員本身条件的限制。即使是我们刚离开的浠水县公社各图书馆（室），恐怕除了能正常地展开图书活动外，要求他们搞这些工作，肯定也有些地方是行不通的，难以实现的。

末了，必须声明，我们的意见肯定是有错误的，不当之处也在所难免。如果说，我们有些意见讲对了，那也只能说为黄宗忠同志的论文作了些小的补充。因为他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是我们大家的集体创作，正如我们这篇文章一样。